

港人醫話

葛新著

学林出版社

GANGREN
YIHUA
GANGREN YIHUA

(沪)新登字11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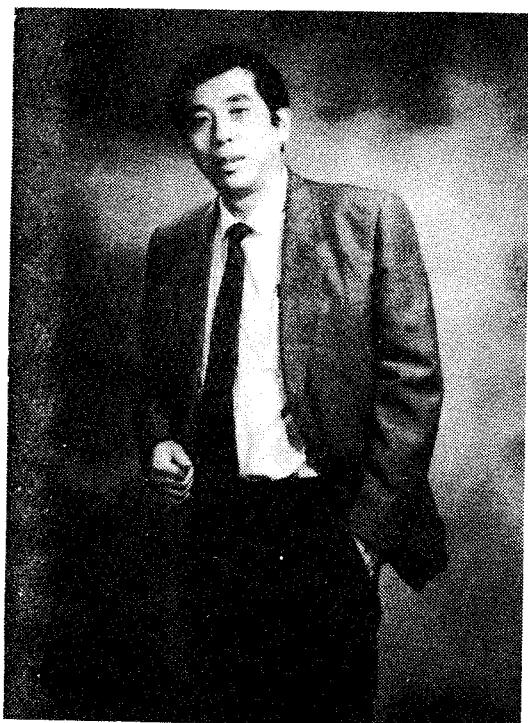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褚大为
封面设计：桑吉芳
封面题字：陈绍宗

港人医话 葛 新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字数85,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ISBN 7-80510-756-4/R·18 定价3.50元



我谨以这本微薄的册子，献给我伟大的祖国；献给我善良敦厚的人民；献给孕育我的大地和江河；献给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师友；献给与我风雨同舟的妻子；献给我医治过的患者和未来的读者。

葛 新

目 录

自序 ······	(1)
爱滋病将蔓延至亚洲、 中国 ······	(18)
爱滋病的由来及传染 途径 ······	(21)
心脏猝死和心脏衰竭 ···	(24)
香港中医、中药业的 危机 ······	(28)
旅游和减肥 ······	(38)
旅游使人长寿 ······	(42)
携带行李实用为主 ···	(46)
吃药的学问 ······	(50)
早期癌症的十个“警戒 信号” ······	(53)
生命在于运动 ······	(57)
可“看门口”的中成药 ···	(60)

女性尿路感染	(64)
性旅游的后果	(67)
莲藕一身宝 病家少 不了	(70)
心脏病患者能否适当 参加运动	(73)
漫谈山楂的功用	(75)
如何吃补药	(78)
治疗感冒的中成药	(82)
漫谈甘和茶	(85)
痰与细菌	(88)
急性扁桃体炎	(91)
旅游须防阿米巴痢疾	(94)
清晨一杯茶饿死卖药 家	(97)
贫血	(101)
蜂蜜的功效	(103)
号称“国老”的甘草	(106)
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样 关节炎	(109)
单味茯苓饮治斑秃	(112)
推拿按摩值得推广	(114)
谈谈冠心病	(117)
泌尿系结石的防治	(121)
黄芪粥治蛋白尿	(124)
谈谈麻疹的中医治疗	(127)

预防小儿感冒	(131)
月经病	(134)
谈遗精	(140)
谈阳萎	(144)
后记	(148)

自序

《港人医话》一书中的篇章，大多数是写于1980年至1981年期间，而其中谈心血管病、爱滋病的文章，是近期为出书而添写的。前者发表于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晶报》等医学版上，以及《星岛旅游》《生活与健康》《镜报》等杂志上。这些报纸的医学版，是每星期出一次。杂志是月刊。当时，我平均每天要写一篇通俗的医学文章。

我是1979年底举家去香港的。出国前，我在漳州三中执教。我学的是文学专业，因此毕业后主要是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不过，我对于祖国医学从小就有兴趣。还在我童年时代，我记得我父亲因肺病而常常吐血，由于经济上困难，无力购买医治肺结核有特效但价格昂贵的西药，他只得化几分

钱买仙鹤草泡开水喝，来抑止咯血。大口大口的吐血居然奇迹般地停止了，挽回了他一命。平时，他身体稍有不适，经常叫我往药铺买回一点中草药自疗。从此，我同中草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2年，我进入福建泉州华侨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就读。强烈的事业感、进取心，使我在一年级时就不分昼夜地撰写一篇几十万字的论文，取名《泥土的歌》，论述臧克家先生的诗。由于超负荷的脑力劳动，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夜整夜地难以入眠。听着墙上的钟声嘀嗒嘀嗒一秒一秒地响过，看着同寝室的同学呼呼酣睡入梦，这种失眠的痛苦实在是难以言喻！我曾试服过西药的镇静剂，但状况一日坏过一日。于是，我求助于我们大学医学系的一位讲师陈绍宗先生。他开了一些汤药给我服食，病情即有所好转。在他的劝谕之下，我去苏州休养了一段时间，针灸、中药、食疗，三管齐下，我的病终于治好了。这位陈先生原来是学西医的，后来响应当时国家的弘扬祖国医药的号召，又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学习中医中药，是中国第一届西医医生中较早学习中医中药西学中的医生，中西医的根底都很深厚。我由于经常看病，同他十分熟稔。平时不上课时，就经常去他校医务室帮助抄方，并不间断地去他那里听他的课。在他的熏陶下、指导下，我也学习了一些中医学概论之类的书，对祖国医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祖国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1968年，我由大学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市第一机

械制造厂。内蒙古近零下三十度的高寒气候，使我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整夜整夜地咳嗽，嗓子咳破了，肺也咳破了，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天在咳嗽，咳出了眼泪，咳出了鲜血。什么样的抗菌消炎的药都试过了，病况依旧严重。我于是只得求救于祖国医药，自行研究，筛选了一些处方。一个宜兴紫砂陶罐，搁在烧煤取暖的炉子上，每天煎汤药，每天如喝开水般不断地喝药，固然病情减轻了，咳血也停止了。

1973年，我由内蒙古调回福建漳州。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愿介入派别斗争中的我，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遥派了。一天两节课上完之后，无事可做，十分清闲。当时，我买了许多许多中医书籍，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和钻研，读了不少中国医学史上著名医学家的著作，如王叔文、孙思邈、张仲景、李东垣、李时珍、张景岳、叶天士等，从中得益匪浅。

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使我萌发了出国的念头。我太太是侨眷，她的父亲在印尼雅加达开一家小商店，母亲随儿子在香港。当时，凭这种海外关系，我们是有理由出国的。1976年开始，政府也允许有海外关系的人迁移香港和国外。于是，我也随这股移民潮开始向公安局申请全家去港。对于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的；不过，我总感到一个人离乡背井到外面谋生并不容易。许多老华侨的发迹史中，他们的早期生活无处不充满辛酸和血泪。我当时作好思想准备，即使是作清洁工，为了孩子今后不至于在国内上山下乡，也毫

无怨言。事实上，我到了香港之后，我面临的生活上的压力和工作上的困难，远比我原先所设想的多得多。目前，我正在撰写一本自传式的书——《我和香港》，从中可略知我在香港的一斑。

我对香港社会完全是陌生的，为了今后到那里后能尽快地适应，或者能找到一份较理想的工作，我在临出国之前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和努力。我强化英文的学习，又学习了日语。我的专业是文学，也希望能进了香港社会后，依旧从事于社会文化工作，于是，夜以继日地写作，完成了《周恩来诗词注释》、《毛泽东诗词注释》、《鲁迅诗词注释》、《中日友好史话》、《论诗的技巧》等稿，共有一百多万字。这些文稿，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我都带到了香港。我所做的另一个准备工作是，我大量摘录祖国医药中有成效的验方、偏方，整理了近千份卡片，也带往香港。

中医的理论，我虽然掌握了一些，但缺乏实践。希望能到医院里实习几个月。我从同学处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华侨大学因在“文革”期间被解散，陈绍宗先生被安排在厦门第一医院任中医科主任。于是，我写信同他联系。他欣然同意我到医院实习。这样，我两次去过厦门第一医院，跟随这位循循善诱、经验丰富的导师临床学习。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不同病症的病人，陈老师总是鼓励我独自施治于病人，我对病人问诊切脉后，对症开出处方。陈老师然后再仔细询问病人病情，对我的处方作了分析和修改；事后，又对修改之后的处方进行精辟的分析

和解释。尽管临床实习的时间十分短暂，因我当时还在三中执教，但是这段时间的实习，使我学到的中医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了，有了施治病人的信心和能力。这为我在以后在香港难以谋生的条件下，决定悬壶济世、从业中医奠定了基础。

1979年9月我举家到了香港，面临的环境比我想象的恶劣得多。初到异地，连一清洁工、杂务工也无人雇佣。之后，在朋友和亲戚的帮助下，我先后当过搬运工人，塑胶下料工、厨房杂工等。在这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我咬紧了牙关，忍受着难以想像的生活的重压，生活着，挣扎着。

尽管我在内地是国家干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自持富有才华，平时清高孤傲。单位领导每每敬为上宾，以礼相待。但来到香港后，我却一筹莫展，连一份普通的粗工杂工也找不到。几经奔走，几经波折，每晚均拖着沉重的步伐，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面对妻子久久期待的目光，听着幼稚无知的儿女对生活的呼求，而自知囊中空空，工作无望，这种刻骨铭心的辛酸和痛苦永生难忘。这种当年贫穷困苦、人生坎坷，也常常成为激励我努力工作、奋战商场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后来，我在一位福建漳州乡邻祥嫂的帮助下，进陆氏实业有限公司工作。在此工作期间，曾发生过一件永生难忘的事，是祖国的中草药挽救了我一命。

陆氏实业有限公司座落在红磡松鹤街，是一家制作电视机、收录机塑料外壳的工厂，老板是

陆××。内地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他较早地投资于深圳的电视机生产，在广东深圳一带颇有点小名气。目前的财产已经逾亿。其人盘剥工人的手段十分厉害，工资低于同类工厂且不说，并在工厂上工时间随时可以叫你去装卸搬运建筑材料、工厂货品或其他笨重的家伙。原因是请搬运工人的费用是比较贵的，反正我们这批大陆新移民，陆老板可以叫我们服服贴贴“人尽其力”。有时老板家里装修粉饰，也叫我们这些工友去义务劳动。从我的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所了解到的，华人老板对工人的盘剥远胜于西人，手段更为厉害，花样也颇多。陆老板也是移民，不过，时间较早些。他依靠了海外岳父的银元，办起了一爿小小的塑胶厂，由于为人的精明和手段的高明，不几年就发展成颇具规模的一家中型厂了。从此，银元更是滚滚而来。

我在陆氏实业公司上工时，我工作的性质是把废旧的电视机壳、收录机外壳粉碎成细粒，然后交下道工人掺杂新的塑料粒，着色整理后再送注塑机，压出新的各种不同颜色的塑料外壳。这种利用旧塑料回炉重整的做法，大大节约了成本。在寸土尺金的香港，工厂是开设在大厦楼房中的，粉碎旧塑料车间、注塑车间、机修车间、包装车间、备料仓库、经理室，总共面积也不到二千平方英尺（近二百平方米），十分拥挤。卫生条件、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没有通风设备，车间中整日飞扬着塑料味的恶臭。几次清晨，我到工厂，看到中毒而死的老鼠。粉碎旧外壳的塑料尘

埃弥漫车间，犹如黑色的大雾。戴了双层口罩，鼻孔、嘴唇依旧发黑。注塑车间需要一定的技术，而我们粉碎车间是毋需技术的，只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就可以了。本地的香港居民不屑做此工作，只有大陆来的新移民补充了空白，成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我们车间全部是新移民，并且95%是内地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有哈军工、天津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厦门大学，我这个华侨大学毕业生，学校牌子还不够硬。一位北大的云先生，因在该工厂工作了几年，患上肺病，我看到他吐出的痰带有腥红的血丝，我劝他休息或转换工作，他苦着脸对我说，不懂英文，不懂广东话，年纪又大，人地生疏，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孩子又小，妻子要照顾家庭和孩子，靠他一人独撑生活的担子，如不工作，吃穿何来？我只得默默无言。

公司每天早上8点半开工，晚上5点放工，中午吃饭休息一小时，由于我居住在香港岛，离工作地点路途较远，先搭巴士，后搭渡海轮，抵岸后需再步行10分钟，因此，我一般需6时起床，此时孩子正在酣睡，5点放工后，加班两个小时，回到家里，一般已是晚上9点了，孩子又刚入睡。星期天或假日，为两倍工资的诱惑，力争加工，因此，竟几个月见不到孩子的亲切笑容，听不到他们的欢歌书声。现在，每当我远离家门，夜阑人静，工作之余，回想起这杯人生苦酒，就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肩上的重担、眼前的方向，鞭策自己时时不要松懈，日日要上进努力！

中午一小时的膳食时间，本来还算宽余，只因香

港工厂区旁边到处是街边大牌档，流动熟食小车星罗棋布，还有包膳送饭上门的，这种大众化的饭菜，十分适合工厂工友，一餐饭大约二～三元港币。但对我们新移民来说，还嫌价格昂贵。我当时每月工资大约为一千六百元港币左右，这包括了月勤工奖，年勤工奖，年终粮等。而当时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租金为600至800元港币。扣去房租，所剩不多，孩子的读书交通费，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个人的交通费、衣食等，真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好在我当时住的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小屋，是我小舅子李辉平先生免费提供的，我永远感谢他在这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的香港社会中，在我处境万分困苦时，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使我也能在香港维持最贫困和最低的生活标准。没有这种雪中送炭的相助，我无法想像今天的事业和成就，也无法想象当时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香港，在许许多多内地年轻人的眼里，只看到香港物资极其丰富和异常繁荣的一面，以为在香港的路上到处有黄金可捡，梦寐以求能出境定居香港。他们并不了解香港，他们只是从香港回乡客的大包小包行李中，他们只是从香港来的生意人在高级宾馆搂着女人对酒当歌的卡拉OK中，只是从电视或电影中的摩天大楼、汽车穿梭般往来的画面中，对香港社会作一鳞半爪的理解和了解。一个新移民，特别是上了三十岁携儿带女的新移民，初到香港生存和立足是十分困难的。一个事业成功的移民，如果他从事的事业是有益于社会和大众的，那么，他的成功之

路必然处处浸透着血和泪。当时的我，连港币5毫一份的报纸也舍不得买，有时只能从地上捡起别人丢弃的来看。中午的一餐饭，我找到了一家新移民做的包饭，一元钱一餐，但从松鹤街走到马头围道的另一头，往返时间半小时之多。远在我大学时代，由于我爱好运动，已经患有了慢性阑尾炎。中午的一餐饭，连奔带跑去草草完成，接着又是开工，干粗重脏活。我的慢性阑尾炎发作了，右下腹整日地绞痛，站在粉碎机旁，脸死一般的灰白，豆大的冷汗直冒。支撑着待到下班，从工厂到巴士站，一百多米远的路程，足足走了四十分钟，按着右下腹，扶着墙壁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马头围道繁荣的夜市，放工后迈着急促步伐返家的蜂拥的人群，行驶中的双层巴士，高耸庞大的工厂大厦，这一切在我眼前构成一幅莫名其妙的图画。这人群，这巴士，这工厂大厦，变成一排排的黑影向我压来，仿佛要吞噬我的生命。“壮志未酬身先死”，我确实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哀。挣扎着回到家里，也不敢向家人出声。每天的柴米油盐，孩子早点午餐费，均等着我的每月出粮。我不做，谁来养我这一家子。想晚上去求诊一下私家医生，一次的诊金要三、五十元，且不包括针药费。我只得忍受着疼痛，自我作些治疗，针灸足三里，同时大碗大剂量饮菊花茶水。这样一连拖了好几天，病情未见好转，也没有出现阑尾穿孔。疼痛一直折磨着我，脸色越来越青白，身子越来越消瘦。管工见我力气不如从前，工作中也不断训斥我偷懒。在这时，我只得再次寻求祖国医

药,能否挽回我的一命。我选择了好多个治疗阑尾炎的方子,但因药方的价格每帖高达十几港元而不敢购买。二三日在中药铺的盘桓、比较,我终于找到了便宜的方剂,甘草滑石散,一大包才五元港币。阑尾炎,中医视为湿热所致,甘草滑石散,清湿热利水,一包药七天连服,药到病除。在我人生奋斗的进程中,因健康而面临断翅之时,是祖国的中草药帮助我渡过了难关。

1980年底,我偶然得到了一次机会,进香港中国旅行社业务发展部工作,工作的情况近乎秘书公关。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使我摆脱了沉重的、长达几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使我有机会发挥了所学的专长,并且有余力去思考今后生活的方向。由于对文学艺术的执着和迷恋,我一开始便向香港的报刊杂志投寄文学方面的稿件。除了几篇论诗歌的文章及一、二首诗在《镜报》杂志上发表外,其余的均失败。探索失败的原因,是我初到异地,对香港社会,香港人的生活、心境,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其次,在香港的文坛上也是论资排辈,像我这种从大陆出来的新移民,被香港人视为“阿灿”(即上海人称乡下人为阿乡之意),是无法占据报纸上的版面的。带出来的几份手稿,我也利用工余时间找过一些出版社,同样无人问津。《论诗的技巧》一家在湾仔区的波文书局的老板黄先生愿意出版,但后来由于他的生意不佳,出版之事也就一直拖下来。在香港,从事文化业也确实不容易。第一版书,能销二、三千本,已属不错。紧张的生